



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

FOREIGN ECONOMICS

FAMOUS WORK TRANSLATION

●〔美〕理查德·豪伊/著 ●晏智杰/译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SCHOOL

● RICHARDS, HOWEY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

●(美)理查德·豪伊/著 ●晏智杰/译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SCHOOL

●RICHARDS . HOWE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98-17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1870~1889/(美)豪伊
(Howey, R. S.)著;晏智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11

(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

书名原文: The Rise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School: 1870~
1889

ISBN 7-5004-2327-6

I. 边… II. ①豪…②晏… III. 边际效用学派-1870~
1889 IV. F09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624 号

Copyright 1960 by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76 千字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 17.00 元

前 言

我在 1987 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中曾经指出，边际主义已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它在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对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边际效用学派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末的兴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正是对这段历史的专门研究，它以其资料丰富翔实、分析严密周到和论述准确生动而倍受读者好评，甚至被视为经典性的著作，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特别是边际主义经济学史的必读参考书；该书初版于 1960 年，早已售罄，学者们往往欲求而不可得，成为书中珍品，有鉴于此，1989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部书。

本书作者理查德·豪伊（1902 年生）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史）家，他于 1926 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1929 年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1955 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29 年起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历任经济学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前后长达 44 年之久，直到 1973 年退休。豪伊教授还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经济学文献收藏家。

1984 年我赴美研修期间有幸与豪伊教授建立了联系，并获

赠一册他的这部名著。在得知本书译事之后，他又应约于1987年8月为中译本写了一篇学术评论性的序言，同时寄来了他的一篇题为“边际主义的起源”的论文，该文是作者于1971年夏在意大利白拉吉纪念边际效用学说问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豪伊教授在来信中说：“这篇论文是对我的著作（即指本书）的补充。一方面，我的书只写到1960年，而这篇论文涉及的范围扩及1971年。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充分利用了《瓦尔拉斯通信及论文集》中的资料，这部论文集是贾菲教授的不朽之作，三大卷，1965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本书择译了作者的这篇论文。

在本书问世之际，我要特地向北京大学西语系王文融教授、东语系杨康善教授、经济系范家骧教授表示感谢，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和认真地协助我翻译了原著中为数不少的法文和德文语句，从而使本书得以圆满译成。全书文责当然应由译者自负。欢迎读者指正。

晏智杰 1987年8月

本书原由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本书中译本即据该版本译出；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以“早期著作”出了重印本。与原版相比，重印本增加了一篇乔治·斯蒂格勒教授撰写的前言，并将上文提到的豪伊教授本人的“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作为重印本的绪论，正文则全部是1960年版的重印。豪伊教授于1989年12月给我寄来一册刚问世的重印本，我据此补译了斯蒂格勒教授的前言，并将“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的全译文作为绪论，正文译文则保持原样。

原书各章的注释集中排在全书正文之后，为了读者阅读方

便，我将注释移到各页正文之下，由于作了这个调整，出现在同一页上的原书注释的页码同原书正文的页码就不连贯了，提请读者注意。

晏智杰 1990 年 3 月

此中译本在译成之后 11 年终于问世，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我要感谢他们对出版学术著作的热忱，对该书学术价值的重视和认同，以及张红女士的努力和辛勤劳动。

晏智杰 1998 年 12 月 17 日

中文版序言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问世后,有幸颇受世人评说。在这个序言中,我想对 1960—1965 年间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本书的评论作一小结,我相信这对晏智杰教授的中文译本的读者是有意义的,就像往昔的游记对今日的旅游者有用一样。

评论者对一本书通常总是有赞许也有贬抑。前者超过后者,可谓肯定的评论,反之,便是否定的;而肯定的评论极易超过否定的评论。本书问世后 5 年间先后获得的署名评论中,属于肯定的评论有 11 篇,否定的评论有 3 篇。

肯定的评论的评语、作者、出处及日期如下: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也许没有人能像理查德·豪伊那样熟悉该学科浩瀚的文件了。”R.M. 罗伯逊,《维多利亚时代研究》,1961。

“一部出色的作品……一篇惹人喜爱的历史记载。”J.E. 巴塞尔,《南方经济杂志》,1961。

“资料可信,文笔优雅。”P. 阿尔特,《科学与社会》,1963。

“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并没有自命不凡,而以一种毫不矫饰和平实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这种学者风度与作风正在学术界迅速地消失。”R. 达塔,《Arthaniti》,1961。

“总之,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很难相信它只有

271 页。” E. 菲尔斯,《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62。

“在近期关于著名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研究中,豪伊的这本书应被看作是最值得注意的贡献之一。” A. 蒙塔纳,《施穆勒年鉴》,1965。

“一般来说,豪伊所用的不是思辨的方法,而是根据最精确安排的事实材料进行研究的。” M. 斯特林塞,《国民经济学杂志》,1963。

“这是一部关于边际效用理论起源的非常精确和深入的历史著作,它出自一位忠实和博学的作者之手。” E. 詹穆斯,《经济评论》,1964。

发表类似评论的还有荷兰的杂志(M. 爱斯金斯,《经济学评论》,1960。P. 亨尼普曼,《经济学家》,1962。)以及丹麦的刊物(K.E. 斯文森,《国民经济学评论》,1961)。

G.H. 布斯凯、C.W. 季尔鲍德和 E. 考德发表的评论则是否定的。他们的观点与本书显然不一致。他们对本书的某些部分看来是赞成的,但总的来说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此不应忽视。

布斯凯评论的开头是一句释疑的话:“这是一部易读的有教益的著作,它介绍了一段我们科学的有趣的历史。”(《政治经济学评论》,1961)布斯凯早在1927年就发表过一部常见的经济学史,我在本书第216页[见中文译本附录注释(24)]提到过这本书。

在一番略显恭维的介绍之后,布斯凯声称,我的这本书不是他所写的那一种:他的书论述的范围更大,开头比1870年早得多,而结尾是在1889年之后很久。此外,他还更多地注意到戈森等重要人物,而不太重视拉韦利和奥托这些相对来说不甚重要的人物。

我起初是想写一部布斯凯所说的那种著作。我深知这样写的优点,但我改变了主意,宁可牺牲广泛的涵盖范围,也要作更详

尽的研究，以阐明边际效用理论进入经济学主体的过程。

第二篇否定的评论是季尔鲍德提出来的，他勉强承认本书作者“看来阅读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甚至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早被人遗忘了……书末的注释也是一份很有用的文献书目单”（《经济学杂志》，1961）。季尔鲍德（他是 A. 马歇尔的侄子）对我的下述结论非常不满：他叔父认为他自己先于杰文斯表述了边际效用思想的说法是错误的。季尔鲍德的这种怨恨使他不能公正地评价本书的其他方面。

F.M. 邓恩从新南威尔斯给我来信，对季尔鲍德的攻击有以下评论：“季尔鲍德的评论是蓄意中伤，不单是因为他对你的整个著作的辱骂，远远超出了有关马歇尔是否为首创者这个次要和部分来说无关紧要之点。既然任何认真和不抱偏见的研究均已表明，马歇尔所谓他惠及于其他人的种种说法，都不过是精心和审慎编造的谎言，所以它也就不仅是一种不真实的说法了。季尔鲍德真正的失误在于，在这样一个大多数出版物简单地、不加分析地重复别人言论的学科中，他的确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严肃批评必定分辨出了某些新颖和富于首创性的东西，而他的惟一目的就是把这些东西一笔抹杀。”

邓恩接着说：“你可以聊以自慰的至少是，时间在你这一边。熊彼特写《经济分析史》时，起初轻率地接受了有利于马歇尔的种种要求，后来又仔细解释这些要求为什么不可能是对的。你则干得直截了当，因而受到了中伤。”

考德是第三篇否定的评论的作者，他长期致力于写作《边际效用史》，此书于 1966 年出版。我在第 8—9 页（中文译本第一章第 v 节）曾提到他的一篇多次被援引的文章（发表在 1953 年《经济学季刊》），指出他“把价值解说的分歧同经济学家的宗教背景联系起来”。

考德评论的第一段以三句赞扬的话结束：“为收集资料付出

了极大的努力”；“充分地解译了数学理论，特别是瓦尔拉斯、威斯蒂德、奥斯皮茨—里宾的观点”；“作者以出色的英语写作，还用了一些辛辣的措辞。”（《世界经济文献》1961）

但他接着说，“尽管有这些优点，本书仍然是不值得推荐的。”他认为，我关于杰文斯的“一位论教派”的背景对其边际效用思想的影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挑出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各章，列举了我所犯的至少四个错误。

由于某种原因，我一直未得到这个评论的副本，对考德的评论也不知晓，O. 摩根斯坦的一封信才使我得以了然。摩根斯坦先后就读和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他在来信中说，“直到最近我才读到你的大作《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我觉得这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和令人鼓舞的著作。您肯定对有关著作（特别是奥地利人的著作）有深入的了解。考德在《世界经济文献》上发表的文章是我迄今所看到的惟一的评论你的著作的文章。在我看来，此文有欠公允，尽管我也觉得书中有一两处错误，这对此类著作来说不足为怪。你能告诉我还有其他人的评论吗？”

我立即作了答复，并附寄了许多评论的复印件。他回答说：“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5月12日的来信和有趣的附件。我认真阅读了这些评论，对菲尔斯的那一篇尤其感到高兴，他对你著作的理解有独到之处。考虑到季尔鲍德同马歇尔的关系，完全没有料到他竟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接到你的来信之前，我曾同巴塞尔（Basel）大学的埃德加·塞林教授谈过你的书，并把你的书给他看了，他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本书。他对该书深表兴趣，发现它是极富有启发性的。”

理查德·豪伊（荣誉教授）

1987年8月14日

斯蒂格勒的前言

豪伊教授的这篇博士论文，在问世 30 年后的今天，理应获得再版重印的殊荣。无论在他以前还是以后，尚无一人如此广泛和精心地论述过边际效用理论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提出到 1890 年的演进。豪伊以其精深的学识，非常细致地追踪了这些经济学家及其同时代人对这一理论的研究。

豪伊的研究没有什么需要后人补充和修正的，他的论述只是在某些更具技术性的细节上不大准确。例如，互补性问题只一带而过；威斯蒂德衡量边际效用的方法（第 131—132 页），只对附加的效用函数才是正确的。除去这些次要点之外，他的论述仍旧是十分可取的。

在边际效用理论出现大约 100 周年时，人们曾集会庆祝。读者如想了解该理论在这个时期的其他方面和后来的发展，可参阅专题论文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刊于《政治经济学史》1972 年秋季号），还需参阅戈森的那部令人惊异的著作《人类关系法则》（英译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3）。^① 不过，对于

^① 这里提到的两本书都已有了中文译本。《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7 年；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1871—1890 年这段边际效用理论的形成时期来说，豪伊的这部著作仍然是标准的来源。

乔治 J. 斯蒂格勒*
芝加哥大学，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

* 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 (George Joseph Stigler, 1911—)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史家，198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58 年以来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现任该大学美洲研究所查尔斯·沃尔格林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生产和分配理论》1941 年；《经济学史论文集》1965 年；《价格理论》1942、1952、1966 年；《工业组织》1968 年，以及《市民与国家》1975 年；《经济学家和说教者》1982 年等。

原 序

1890年以后，经济学学术研究的课题与1870年以前相比是大不相同了。在这20年间，经济学经历了像以前各时期一样剧烈的变动。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边际效用学说进入了经济分析。1871年前，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对边际效用作过任何重要和公认的应用，而在1889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大多数经济学家则感到不得不利用边际效用，或者不赞成利用它。因此，要想很好地理解1871—1889年经济学的现代化，就非理解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作用不可。在说明现代经济学演进的一个特点方面，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历史具有普遍的意义。

本书限于研究这20年，以囊括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大部分阶段，甚至包括某些细微末节和附带的方面。对1871—1889年边际效用的完整研究，使早先的断代史研究得以补充，而这段重要的历史以往却被忽视了。这个研究应为其他的研究、特别是为精雕细刻地研究边际效用思想后来的历史，以及它最终局部的复归，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除了介绍许多新资料以外，本书还想对有关著作所提出的各种不甚重要的和少数重要的解释加以评说。主要更正在于，排除了以为边际效用思想很快就被人们接受这个论断。实际的情况确

非如此。边际效用思想进入经济学家们的头脑是非常缓慢的，它不得不靠逐渐地克服惰性和更缓慢地克服对立面来赢得胜利。有些经济思想史著作常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作一问世，他们的观点就传遍了世界，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和观点就起了明显变化。但思想上的突破并不是这样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形成于我们所研究的这 20 年之末，但在整个这 20 年之内，边际效用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然而次要的经济思想，是与旧的学说同时并存的。

本书第一部分（第 1—5 章）带有绪论性质，主要是追溯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 1871 年以前的思想发展，他们于 1870 年代初分别发表的著作标志着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开端。第二部分（第 6—7 章）比较了效用学说在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里程碑式著作中所起的作用，以揭示边际效用学说的起源，以及他们的划时代著作的内容。第三部分（第 8—25 章）考察他们思想的缓慢扩展和偶尔的再发现。最后的第 26 章和附录是结论和对有关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的详细研究。

《早期著作版》绪论

边际主义的起源*

I

①约翰·霍布森在《工业与财富》(1914年)一书中首创“边际主义”一词,用以概括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的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②它首次出现在“‘边际主义’在学术界已被普遍接受”这句话中。当然,接受的是思想而不是“边际主义”这个词。从上下文来看,霍布森是在贬义上用这个词的,因为他发现这个概念有缺点,而且其政治结论也不受欢迎。他在《工业与财富》中用了7次“边际主义”这个词。霍布森在1909年曾把使用边际分析的经济学家叫做“边际主义者”。①

“边际主义”这个词在霍布森首创之后的25年中不常被使

* 此文采自《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于树生译),本书译者作了必要的校改。——译注

① 该数字系原书页码,下同。

② 第174—175页和第331页。

① 霍布森:《工业制度》,纽约,1909年,第114页。

用。在评论霍布森《工业与财富》的人中，没有人视“边际主义”一词为新词。该词得以流传，完全是由于霍布森独一人之功，他在自己的著作《社会科学中的自由思想》（1926年）中，插入了题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一章。两年后，《国家学说袖珍词典》第四版的整个索引中，在“边际主义”主题条目下只有一处提到霍布森。“边际主义”和“边际主义者”这些词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1935年）中很少见到。^①

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在1930年代的广泛使用，引起理查德·莱斯特的抱怨，他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边际主义的详情细节”充斥着美国教科书的1/3到1/2。^② 他的抱怨标志着“边际主义”这个词再次作为贬义词被使用。翌年，莱斯特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用了“边际主义”一词，使它更显突出。^③ 麦克洛普为反边际主义者准备了最长的答复，他在答复的第一部分采用了这个词，从而接受了它。^④

莱斯特在1946年发起的那场边际主义论战，到1961年告一段落。“边际主义”一词经此论战而有了新的含义。例如，在美国经济协会编制的《经济论文索引》（其前身是《经济刊物索引》）的主题索引中，“边际主义”只限于指研究边际成本或边际生产力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此项索引在“边际主义”项下没有列出1925—1945年间的任何一篇文章，却大量列举了1946—

① 第1卷，第166、175、176页，第10卷，第609页。

② 莱斯特，“在工资—就业问题上边际分析的缺点”，《美国经济评论》第36卷（1946年），第63页。

③ 莱斯特，“边际主义，最低限度工资和劳动市场”，《美国经济评论》第37卷（1947年），第135—148页。

④ 麦克洛普，“边际分析和经验主义的研究”《美国经济评论》第36卷（1946年），第518—554页。

1961年间关于莱斯特论战的文章，从1962—1966年在“边际主义”项下又没有列出任何文章。但至少有两位作者指出，“边际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①

“边际主义”一词之新颖，从词典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词首次进入普通的英文词典是在1966年，当时《韦伯斯特词典》第3版把“边际主义”解释为“一种经济分析，它强调边际特性在决定均衡中的作用”。在其他文种的词典中，只有葡萄牙文词典不是仅仅用其“特性”之一来解释“边际主义”。

公认的和连续的边际主义史，是随着现今被称为“边际效用”的这种“特性”的出现而开始的。已经有了若干有关边际效用起源（从而有关边际主义的诸种起源之一）的研究著作问世。^②按照一般的说法，以后来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来说，边际效用学说是从1862—1874年间，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首次成功地和各自独立地提出来的。人们一般也都同意说，1871年是这些年中最为富有成果的一年，在这一年杰文斯和门格尔分别发表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

边际生产力是霍布森的“边际主义”所包含的第二种“特性”，它也有许多的先兆。然而直到1890年以后它才被人们完全发现和认识，也就是说，直到边际效用已被众多的有潜在影响的经济学家接受了以后，边际生产力理论才受到有系统的考虑。

这种接受是极为重要的。边际主义的第一种“特性”并没有

① 对边际效用历史的篇幅较长的论述有：斯蒂格勒，“效用理论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杂志》第58卷（1950年）；豪伊：《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劳伦斯，1960年；考德：《边际效用理论史》，普林斯顿，1965年；贾菲：《里昂·瓦尔拉斯的通信和有关材料》，阿姆斯特丹，1965年，一套三大卷，本书是一部关于边际效用史的内容丰富的原始资料著作。本书论述的许多问题的更详细的资料，可以从中找到（通过查阅标题和索引）。

② 克佩尔，“边际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莱比锡，1930年；勒曼：《边际理论》，东柏林，1968年。